

答疑解惑

共同富裕：要共同奋斗 不要平均主义

■ 胡 敏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还是在于共同奋斗。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我们要实现14亿人共同富裕，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这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继续苦干实干、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的征程。

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

党中央提出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和呼应。但一个时期以来，对共同富裕中“共同”的理解也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有的认为是大家一起“同时”同步达到一个富裕水平，有的认为是社会财富可以平均分配了、劳动成果可以利益均沾了，有的甚至在思想认识上又陷入了绝对平均主义的误区。

这些想法和认识是不切实际的、也是错误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

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非常明确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谈到平均主义，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中国古人提出的“均贫富”的朴素思想，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提出的“均田均富”口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国生产力还没有很好发展的条件下，盲目地搞“一大二公”等冒进主义做法，后来我们指称为平均主义大锅饭，这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也违背了生产力发展规律。历史的教训是发人深醒的。

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

我们今天所说的共同富裕，在思想理念、本质的、发展目标和实现路径上与平均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共同富裕绝不能与平均主义画等号。

在思想理念上，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出发点和落脚点。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总是用“均田均富”口号调动下层劳动者的力量一起来推翻统治者，无非实现了朝代的更替，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封建统治的制度根基并没有变。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搞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给广大农民平均分配土地，但本质与过往

完全不同，根本上是要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彻底解放农民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限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经验上的不足，我们在分配制度上失于绝对平均主义，走了一点弯路。因此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明确提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平均贫困。

在本质的和发展目标上，我们的改革就是从打破平均主义开始，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经过全党全国人民艰苦卓绝的顽强奋斗，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我们也更加深刻认识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必须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既能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也能防止社会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和谐安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在实现路径上，我们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

进共同富裕。首先是把“蛋糕”做大，大力提倡和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我们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积极创造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社会政策环境，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但不搞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强调要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不能助长靠偏门致富、靠资本掠夺的社会风气。其次是要把蛋糕分好，通过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的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

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还是在于共同奋斗。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我们要实现14亿人共同富裕，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这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继续苦干实干、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的征程。

那种奢望坐享其成，贪图平均主义施舍，希冀天上掉馅饼、能吃共同富裕目标的“大锅饭”的任何制度和做法，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思想者观察

社会主义主流文化需要多元亚文化来滋养和补充，我们要建立新时代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相通的价值和观念，又有属于自己独特价值和观念的多元亚文化。

“饭圈文化”作为一种圈子文化，其实就是一种亚文化，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与社会空间。亚文化是一种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它不是作为主流文化的对立而存在，而应理解为是对主流文化的补充和促进。人类社会存在很多的圈子，人种、民族、语言、性别、文化程度、兴趣爱好，乃至不同的大小空间和时间，都是圈子，都是圈子，都有圈子就有圈子文化，有圈

刘建华

安徽省中国特色

作用，也有负向作用，当技术被作为生产者的明星和作为消费者的粉丝负向利用时，就变成了某种扭曲的行业市场。当该行业的社会生产总过程完全偏离价值规律与市场效率，社会再生产不是靠优质精美的高质量产品说话，而是被一条灰色产业链裹挟着，在不良资本、流量经济、职黑水军、恶营销、无底线追星、网暴互撕的滚滚黑浪中，“饭圈”畸形发展，作为亚文化的“饭圈”文化变成了垃圾文化，污染了整个社会的正确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严重伤害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价值塑造，到了不整治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

对不良“饭圈”的整治政策出台以来，治理效果较为明显。从生产者来看，畸形的明星光环不断减弱。作为生产主体的明星、导演、影视公司，因偷税漏税、阴阳合同、天价片酬、性侵犯、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问题被惩治，高高在上的明星和名导演作为一个群体被拉下神坛，畸形的光环效应不断减弱。从消费者来看，粉丝的非理性追星有所遏制。作为明星偶像的各种粉籍，不断曝光的明星丑闻，接二连三的银铛入狱，摧垮了“饭圈”文化的信仰支柱，三观受到严重震碎，促使其逐渐回到正常的思维方式和正确的“三观”轨道。从流通渠道来看，各大互联网平台纷纷加大自我管理力度。一定程度而言，不良“饭圈”之所以能够存在，作为流通渠道和接触终端的互联网平台发挥了关键作用，没有依托于一些互联网平台的社交媒体，这种畸形的“饭圈”文化及各种撕黑、买周边及打榜等问题也就没有生存土壤，一些互联网平台对于“饭圈”毒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整治政策出台以后，各大互联网平台发布了整治“饭圈”乱象公告，特别是对诱导未成年人无底线追星行为进行重拳打击。

从行业组织来看，各文娱行业协会加强监督担当社会责任。比如吴亦凡事件发生后，中国影协、中国音协、中国视协都纷纷发声，中国影协指出德不配位的明星如同空中泡沫，飞得再高，膨胀再大，也终会破灭；中国音协认为，健康的行业风气是音乐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保证；中国视协强调，所谓顶级流量、粉丝后援、外籍身份都不具备为所欲为的特权，绝不是违法失德的护身符。最近，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关于加强演艺人员经纪机构自律管理的公告》。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行业协会应有的责任担当。

从社会环境来看，各种力量推动文娱领域变得不断清明。公、检、法、司机关是维护文娱领域清朗环境的保障，一旦出现违法犯罪行为，都难逃法网；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在培养未成年人正确“三观”、塑造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加大力度，尤其是00后、10后的青少年，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对于党的领袖和革命烈士的真心爱戴；家庭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最小组成单元，大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家风建设”；社团组织在公德良俗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对青少年正确“三观”的塑造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今后，我们如何做，才能使文娱产业得到持续的平衡和充分的发展，生产出高质量的文娱产品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求呢？首先，我们在整治“饭圈”文化乱象进行“破”的同时，还要有“立”的观念。要破立并举，在打破“饭圈”文化乱象时，建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协调的健康“饭圈”文化。其次，用亚文化理论来分析我们的“饭圈”文化建设。“饭圈”与其他圈子文化一样，作为与主流文化并存的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繁荣发展是有益的，有其存在的历史和现实价值，社会主义主流文化需要多元亚文化来滋养和补充，我们要建立新时代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相通的价值和观念，又有属于自己独特价值和观念的多元亚文化。

最后，要营造正向的亚文化。除了用主流文化去施加影响外，更有效的路径是用正向的亚文化去引导负向的亚文化。我们知道，健康的亚文化，具有解构主流文化的潜质，不加以控制，就可能滑向负面。因此，需要正向的亚文化去不断引导，需要不断地巩固。当“饭圈”乱象不断消除，负向的“饭圈”亚文化也必将被正向的“饭圈”亚文化所代替。

学者看法

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现实选择

■ 雷 明(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

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同质性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系统性共同富裕，是部分到整体的渐进性共同富裕，同时也是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螺旋上升性共同富裕。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共同富裕。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最终靠的是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产力最终决定生产方式的存在、发展和变革，有什么样的生产能力就有什么样的物质生产的关系和生活关系。所以，发展是硬道理，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没有发展，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共同富裕就无从谈起。

收入有基础，分配有保障，共同富裕才有可能得以真正实现。必须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当代世界各国社会实践也表明，经济发展和提升全体国民整体生活水平之间也并不是简单的正线性相关关系。虽然说国民总财富的增加是提升全体国民生活水平的物质基础，居民可支配收入也是在对国民总财富进行分配以后形成，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最终还是要通过提高低收入个人和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来实现，收入形成同样构成最终决定全体国民生活水平的关键一环，同样也是决定共同富裕能否最终实现的关键一环。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只要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国民总财富增长，就能消除低收入现象，实现全体国民整体生活水平共同提升，而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经济增长只是提升全体国民整体生活水平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收入分配在提升全体国民整体生活水平中扮演着更为关键性角色。

因此，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

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公平正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朝着美好社会目标扎实迈进。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有一个公正有效的做蛋糕的机制，同样需要有一个公正有效的分蛋糕的机制。这里所谓的做蛋糕机制就是一个能够有效地激励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组织、各个团体、各个族群，每一个人，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尽全力，自觉自愿地地积极参与到做大蛋糕的工作中的机制；而分蛋糕机制则是一个能够充分保证蛋糕分配的公正性，使得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组织、各个团体、各个族群，每一个人，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充分感受到公平公正的机制。在创新体制机制过程中，始终坚持既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与效率导向，又充分体现公平正义这一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的基本原则。

现实选择：共建共享实现共同富裕

在共享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有效增强发展动力，巩固与厚植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需要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逐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党的领导地位，强化党建引领共同富裕。现代政党理论认为，在强大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价值关系中，强大政党建设具有历史主动性，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

其次，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奋斗目标就是共同

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中央反复强调，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导致了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要使中国人民尽快从整体上摆脱贫穷，唯一的道路是打破平均主义的桎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依法合理的调节收入格局是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内容

随着生产力问题的逐步解决，党中央敏锐地觉察到，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避免出现两极分化。1984年，邓小平同志于当年11月9日会见意大利客人时首次使用共同富裕的概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他同时提出：经济发展起来后，当一部分人很富的时候，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1985年3月7日，他进一步指出：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到1990年，他更加清晰地表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

可见，通过所得税、调节税等现代财税手段对收入分配格局进行依法合理的调节，在30年前就

是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内容，并且进行了长时间的实践。配合工资改革，1985年我国实行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国营企业奖金税、集体企业奖金税和事业单位奖金税，采用超额累进税率。1986年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暂行条例》，1987年新增个人所得税，1988年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所得暂行条例》。1994年我国进行分税制改革。

在构建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制度方面稳步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依法合理调节收入格局，在构建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制度方面稳步前进。以关键的税收调节手段为例，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和精准性，体现出非常鲜明的加强税收调节、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指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最新阐释中进一步明确，合

热点聚焦

加大收入调节力度 依法推进共同富裕

■ 周 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其中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一重要文章释放的强大政策信号为我们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更为精确的科学指引。

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已经成为社会热点，对此的讨论不乏真知灼见。当然，对错误认识也必须大力澄清并加以排除。自共同富裕思想形成以来，其各项举措始终建立在依法合理的坚实基础之上，以税收、社保、转移支付为主要代表的分配调节手段，其目标都是实现保护合法收入和调节过高收入的高度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